

理學鼻祖與理學名城

朱惠芳 著



理學鼻祖與理學名城

朱惠芳 著



岳麓書社 · 長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学鼻祖与理学名城/朱惠芳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4.8

ISBN 978-7-5538-0278-7

I. ①理... II. ①朱... III. ①周敦颐(1017~1073)—理学—思想评论②文化史—汝城县 IV. ①B244.25②K29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6452号

LIXUE BIZU YU LIXUE MINGCHENG

理学鼻祖与理学名城

作者:朱惠芳

责任编辑:管巧灵 邱建明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周麟祥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http://lzfts.tmall.com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5

字数:94千字

印数:1—5000

ISBN 978-7-5538-0278-7/B·131

定价:28.00元

承印: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序

十多年来，基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个地区都陆续将发掘地方的文化资源、承续和发展地方的文化传统，纳入到施政的议事日程中。这种措施，并非单纯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开始有条件对精神层面的文化有着更高层次的自觉诉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化建设不仅可借以端正人们日益增长的物欲诉求，以免偏移正轨，更可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良性的互动。

作为湖湘水土哺育出来的本土学人，除了致力于湖湘文化的宏观研究外，我也应邀参与了一些地方的文化研究工作，奉献着自己的微薄之力。在湖湘广博的沃土上，这些地区虽然只是区区十几个点，但它们散布于湖湘大地，分别有着不同的文化基因，有着各异的文化特征。在学术研究时，我觉察到一个较为奇怪的现象。按照常理来说，经济的发展应该是与文化的发展同步的，一般而言，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较之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综合性的教育资源较为丰富，文化的发展程度也必然较为领先，所培育产生的各种人才当

然也更多，在古代这体现在科举考试上。例如江浙地区，自南宋以降，无论是按人口的相对统计还是按地域的绝对统计，进士的人均数量大大领先于其他地区，这当然与唐宋社会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密切相关。但是，在湖南则并非完全如此。多年前，我与学兄刘范弟先生在编纂《湖南历代进士科第年里综表》时，就明显看出，在一些时期，湖南人均进士数量较多的地区却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湘南等地，例如永州和郴州。在唐宋时期，湖南永州的某些地区，如宁远县是人均进士较多的地方；在明代，郴州的汝城县（明代桂阳）则是人均进士较多的地方。汝城地方文化学者朱忠悦先生曾经做过统计：“明代汝城共中举人 54 名，其中又中进士者 15 名。……平均每 4.4 年中举人一名，每 16 年中进士一名。……从举人角度来说，明代汝城所属的湖广行省，辖 15 府学、16 州学、110 县学。按照府学 40 名、州学 30 名、县学 20 名的廪生数规定，全省共有廪生 3280 名。每三年一次科举乡试，前期录取举人 60 名，后期增至 83 名，平均不足 72 名，每届平均约 46 个廪生名额取一名举人，每县平均要 7 年才有一个中举名额，汝城平均只有 34 名举人名额，而汝城平均每 4.4 年中举一人，举人数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数。……明朝人口在 7000 万至 8000 万左右，而作为偏远山区的汝城只有数千户、1.5 万人口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二，可见汝城能取进士者 15 名应该是在全国中上水平。”其中还有两次二人在同科同中进士者，这就是正统十年乙丑（1445）朱英与族兄朱海同中进士、弘治九年丙辰（1496）曹琚与范渊二人同中进士。要知道，在明代，地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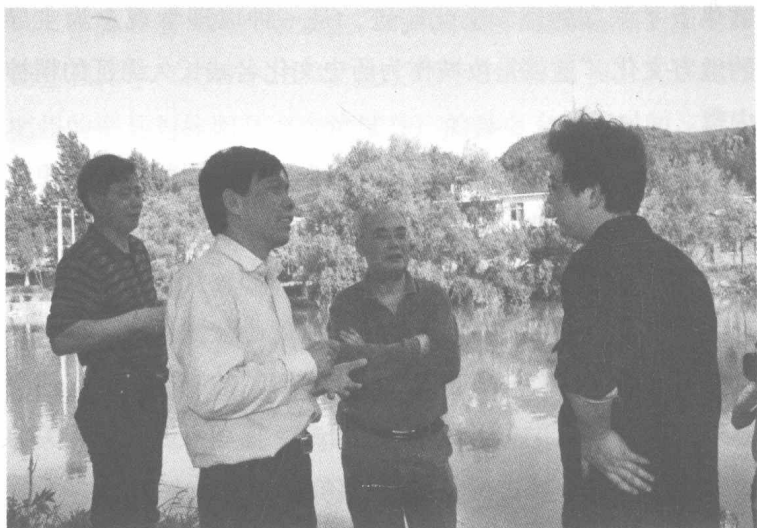
偏远的小县汝城，其人口构成中，不仅是有着大量的军籍户，还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所谓“军籍”，即其户籍的种类属于军籍的军人，亦称“军户”。军户制度是明代为求确保军队的永续战力、确保军源而制定的制度，基本上是承袭元代户籍的分类而来。具体的分类，据《明史》云：“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一旦被确定为军籍，除非有特殊变故，子子孙孙都不能改变。“军籍（军户）”的法律地位比“民籍（民户）”要低，赋税劳役及其他额外负担却更为沉重，加之许多宗藩、勋贵、军官对军人乃至军户进行役使盘剥等原因，致使军籍之户时有逃亡等事情发生。故军户制度弊端丛生。这些都影响到军籍子弟受教育的机会远比普通民户的子弟要低。前述之朱英与范渊，就是出身于军籍家庭。朱英的亲弟弟朱惟庆就曾经为了将受教育的机会让给哥哥而被派遣到明代镇远府下辖的“偏桥卫”（位于今贵州省施秉县境内）戍边多年，后来因自己的品德行为受到“都指挥告某”的尊重，并在“以母老哀鸣，一卫怜之”之下，“遂得解伍以归”；朱英之子朱守孚也是以“军籍”身份参加科举考试并于成化五年（1469）中进士。正是如此，经济状况的贫穷、文化资源的贫乏与社会地位的相对低下已经严重影响了汝城人才的孕育。但是，明代的汝城却成为湖南人均进士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这显然有着另外的重要原因。这就是，汝城是一个有着深厚理学思想传统的地区，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周敦颐。

作为“道（理）学宗主”的周敦颐，自宋仁宗庆历七年到至和元年（1047—1054，先生时年 31 至 38 岁）先后出任郴州的郴县与桂阳县（今汝城县）的县令有七年时间，其中在汝城的时间有四年多（1050—1054）。这是周敦颐仕宦生涯中在一个地区任职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周敦颐三十而立之后思想日趋成熟之时。在这段时间，周敦颐为郴州知州李初平讲道，向程颢、程颐兄弟授学，从而使自己的学术思想更为缜密、更为系统、更为完善。在周敦颐的许多过化之地，自南宋以降，都修建有濂溪书院，但是，如同创建于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迄止于 1986 年因改为文物保护单位而停办、其教学功用绵延近八百年时间而不间断的汝城濂溪书院，却不多见。这既是汝城人对周敦颐的崇尚景仰和历史记忆，更是继承发扬周敦颐理学思想行为的最佳场所。周敦颐的精神思想余泽沐浴着汝城的人文发展，成为汝城人的一种自觉的文化骄傲和思想行为基因，无疑也熏陶和激励着人才的涌现。这些人才中，既不乏诸如朱英等学术与事功俱佳的理学名家，也有清正廉洁、不避权幸、青史留名的“铁面御史”范辂等。由此可见，作为儒学正统的濂溪理学在汝城地域性文化传统的建构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汝城县至今保留着的 710 多座古祠堂，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仍然产生着作用，我称之为理学思想熏陶下之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活化石”。这是理学思想在湘南地区民间化、世俗化，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社会中的展现。2007 年 4 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评审公布，“汝城县城”成为第四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正如论者所云：“汝城（桂阳）的地方文化

被烙上了深刻的理学文化印迹，是一种以理学观念为主导的地方文化。”这就是汝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长久绵延的精神内蕴。

自南宋迄今，汝城的民众大都自觉地以周敦颐的思想言行作为自己的准则，并且对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弘扬；外地出仕到汝城任职的官宦也同样如此。我的学友朱惠芳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朱惠芳先生既是汝城人，又长期在汝城的不同领导岗位服务于民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潜心致力于汝城地方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撰写了近十种相关的著作，例如《汝城古祠堂》、《红军长征在汝城》等，不断地给人以惊喜。这本《理学鼻祖与理学名城》就是朱先生的新著。正如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诗中所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与我们基本囿于象牙塔中钻故纸堆的学人不同，朱先生不但精读深研地方历史文献，更注重进行实地的田野调研，足迹遍布汝城的山山水水，视野纵贯汝城的古今，因此，他的著作既能够紧贴地方的现实，又有着较强的学术性，从而能够深入浅出地为我们展现汝城的历史风采和人文底蕴。在这部著作中，朱先生从“道学宗主好县令”、“理学鼻祖奠基作”、“一脉相承名学府”、“敦教过化边徼地”、“理学名城展古韵”五个方面论述了周敦颐在汝城的仕宦经历、周敦颐的著作及其思想精华、汝城濂溪书院的历史沿革及教化功用、周敦颐的思想行为对汝城人文的深远影响、周敦颐在汝城的历史文化遗迹及其新貌等，文风严谨，文采洋溢，美不胜收。作为本书的一个较早读者，捧读之余，我也愿意向诸多学友推荐，共同检视作为



作者(左二)陪同湖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万里(右二)、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刘范弟(左一)、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周建刚(右一)到太极子乐湾调研考察

中国思想文化巨人的周敦颐与汝城绵延不绝的种种因缘，感受在理学思想熏陶下的汝城悠远深厚的人文历史，并且对汝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未来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我想，这也是朱先生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研究汝城地方文化并撰写此书的初衷之一。

2014年5月1日万里谨序于长沙

目 录

第一章 道学宗主好县令	001
第一节 边徼县令治绩尤著	002
第二节 治学立说开阐道学	005
第三节 讲学授道育出高徒	008
第二章 理学鼻祖奠基作	014
第一节 一图一说阐述世道哲理	014
第二节 一说一赋概叙为人品德	020
第三节 道学宗师受谥尊为元公	025
第三章 一脉相承名学府	029
第一节 九度修葺建成书院	030
第二节 千年学府受人瞻仰	033
第三节 道学思想启迪英才	047
第四章 敦教过化边徼地	067
第一节 理蕴融民众心	067
第二节 修学绵延文运秀	073
第三节 濂溪抚得为官廉	077

第五章 理学名城展古韵	081
第一节 太极予乐湾——理学文化发源地	082
第二节 濂溪书院——理学文化教化地	089
第三节 汝城古祠堂——理学文化承载地	092
第四节 历史名城老街区——理学文化过化地	101
第五节 太保第古村——践行理学名望地	113
第六节 津江古村——和平之歌飞出地	119
第七节 行政新中心——理学文化发展地	125
主要参考文献	128
后记	131

第一章 道学宗主好县令

汝城，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自然景观非常壮丽。因属南亚热带到中亚热带的过渡分界地段，长年雨水丰沛，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汝城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历史，既有百园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出土了西周时期铙等重要文物。汉继秦时，一些从北方来南粤征战的士兵流落于此，助推了汝城人文的发展。至今，汝城本地话中，还保留了许多秦汉古音。汝城置县始建于东晋穆帝升平二年（358），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先后取名汝城县、卢阳县、义昌县、郴义县、桂阳县、汝桂县等，1913年复称汝城县。县城虽然海拔600多米，周边平缓的丘陵平地却阔达200平方公里。四周低，山中平坦，属典型的山间盆地。天佑福地，在这山中之城，历史上两位圣人所作的伟大发明创造，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甚至东南亚人类文明社会的进程。4700多年前，炎帝率部落跋涉神农架、横渡长江，游居湘南。在这里，他发明创造了耒耜，首开华夏农耕文明之先河。北宋皇祐二年（1050），一位风华正茂、气宇轩昂、眼光深邃的壮年人，来到汝城（时称桂阳）担任县令。其在励精图治的同时，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开阐理蕴，著述立

说，创《太极图》，并写成了《太极图说》，建构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与骨架。他，就是后来被尊崇为“道学宗主”的圣人——周敦颐。

第一节 边徼县令治绩尤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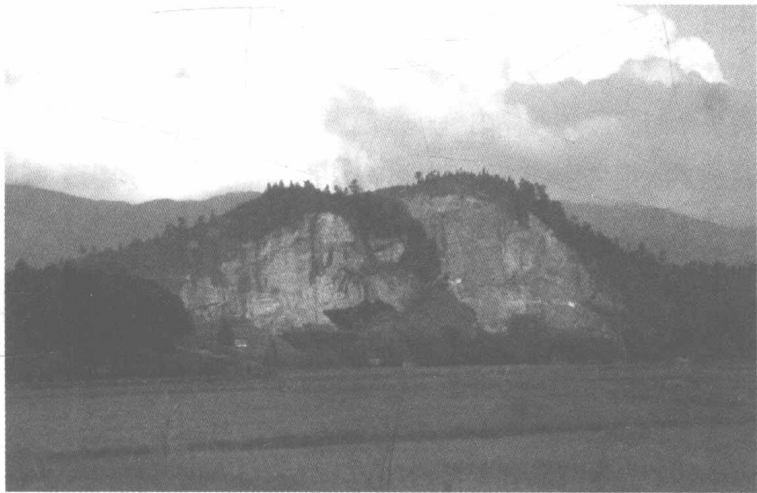


周敦颐

周敦颐，字茂叔，原名敦实，因避宋英宗旧讳改名敦颐，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卒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晚年隐居庐山之莲花峰麓，筑书斋。因屋前有一溪，乃以其家乡濂溪为之命名，亦称书斋为濂溪书堂，于是后人又称他为濂溪先生。其任过洪

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县）主簿、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县）司理参军。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冬，提任郴县（今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县令，皇祐二年（1050）改任桂阳县（今汝城，后同）县令。

汝城虽建县较早，然当时地处边徼，经济贫困，教育落后，时有盗贼捣乱社会安宁。周敦颐到任后，尽心治县，成效逐显。



耒山

兴修水利促农桑。史载县城南五里有耒山，即城头寨，是炎帝神农氏首作耒耜之地，后人建有神农庙祭祀。周敦颐感先人之伟绩，于每年立春之日，亲率吏民到城头寨神农庙祭祀先祖，下田扶犁，劝事农桑。他还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据清同治《桂阳县志》载，县内最早建成的官塘是泉塘池，“在县东六里许，尖岗岭下，亦说是宋濂溪凿，灌田数十顷，今湮”。周敦颐初到桂阳时，这里是一个仅有三千余户的偏远小县，境内山涧沟壑纵横，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水涝、干旱经常出现。周敦颐为改变这种状况，组织民众筑山塘、修水渠。他亲自爬山越岭，考察地形，确定了泉塘池的坝位。并采纳工匠意见，使用石灰、黄泥、沙子加糯米稀粥制成的三合土筑坝。在大兴官塘的同时，他又号召乡绅大户捐资修筑民塘。从而使得全县防汛抗旱能力大为增强，鼓动了民众耕作的积极性。浙

水河（古耒水）上游的星村、下清各自擅长木犁和斗笠，自古就有“下清的斗笠，星村的犁”之美誉。他每每为村民勤耕乐作而高兴。在桂阳（今汝城），他写下了《牧童》一诗，表达了欣悦之情：“东风放牧出长坡，谁识阿童乐趣多。归路转鞭牛背上，笛声吹老太平歌。”

创办县学兴师道。汝城的县学为周敦颐首创。据民国《汝城县志》记载：“按《通考》，宋初有郡国乡党之学而无州县学。皇祐四年，始诏州县立之。”为创办县学，他号召乡绅捐资办学，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并修复了孔庙。还在大成殿内开设讲堂，亲自授课。周敦颐的兴教之举，开启了汝城教育的新风。

植莲修身纯民风。据《郴州地区水利志》载：“（汝城）爱莲池是郴州地区史料记载有明确年代的最早的池塘，系周敦颐为邑令时所凿。”《汝城县志·建置志》云：“爱莲池，周濂溪为邑令时所凿。遗址在典史署北，县堂之东。”周敦颐在汝城凿池植莲，并以莲花之高洁，寄托心志，修身养性。县志记载，他在爱莲池旁建一亭子，名曰“养心亭”，先生常在此吟咏诗文。宋嘉定十五年（1222），桂阳县令周思诚在《初建濂溪祠记》中记：“邑之士尚能记盗火前，县厅有木匱一，其高四尺，其阔视其高加尺焉，以贮官文书。其上镌‘庆历四年，桂阳县令周’十字，而书押于下，实先生时旧物，然煨烬亦久矣。”木匱是一种书柜，用于存放官署文件、案卷和读书资料等。此记载虽年份有出入，但说明一介县令，尚能如此清廉为政，确为楷模。周子植莲修身之言行，廉洁俭朴之风范，对汝城淳朴民风及清廉官风的形成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惩恶扬善倡正气。周敦颐为官尽心于政事，断案公正清明。其在桂阳任县令期间，每遇案件，常翻山越岭，到实地了解案情后再升堂公审。为使讼案公断，他还经常率衙役亲捕逃贼。他判案刚正不阿，公正无私，赏罚得当。他的公正清明、匡扶正义和惩恶扬善的浩然正气，令衙门里的众官吏肃然起敬，也深获当地民众的赞誉，促进了社会正气上升，邪气收敛，风清气正。

周敦颐任桂阳县令四年间，励精图治，倡民教化，劝耕讲学，政绩卓著，把汝城治理得政治清明、民风淳朴、文风渐兴、农商兴旺，讼庭之事也日渐减少。其在南安任职时的上司虔州知府，也是相知赵抃，在寄周敦颐诗中对他在湖南的政绩给予了赞誉。赵抃《寄周茂叔》诗为：“君向濂溪湖外行，倅幡仍喜便归程。九疑南向参差碧，二水秋临彻底清。诗笔不闭真吏隐，讼庭无事洽民情。霜鸿已到衡阳转，远绪凭谁寄数声。”《宋史·周敦颐传》评价其是：“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

第二节 治学立说开阐道学

周敦颐志趣高远，博学力行。其所处的北宋赵氏王朝统一了中原，结束了长期混乱和战争的局面，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但随着外来文化冲击，正统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每况日下，加之政治腐败，道德沦落，使得胸怀大志的周敦颐非常焦虑，促使了他为振兴传统儒学，寻求



道士仙

正道治国文化之研究。

汝城虽属边徼之地，但儒、释、道传入较早，道教、佛教分别于唐朝中期、末年传入。民国《汝城县志》载：“世传智俨与南华六祖大师，同时云游至县，袖带一古铜如来佛，约五千斤，先到开山铺北路西二里，盖石峰寺，为住持。”此外，还有如白云仙、道士仙、白石庵、西禅寺、报恩寺、圆明庵等寺院宫观对周边影响较大。白云仙通天祠始建于唐朝末年，历史上曾为湘粤赣边界道教中心。板栗乃道家的养生食物，曾被道家尊为“神树”，汝城自唐代就随道教的传入而引入种植。至今，永丰等地还生长着数株几百上千年的板栗古树。

周敦颐对儒释道学颇有研究，并喜结交有学识之人，常常与高僧、道人游观山水，吟诗作赋。他尤其与陈景元酬唱来往较多，对道家朴素的哲学思想感受甚多。汝城距禅宗祖庭，即广东韶关的南华寺仅百里之遥，又有名家引佛入汝，